

【城市记忆】

城隍庙里的学校

□黄杏林

1963年7月，我大学毕业被国家分配到山东省财政金融学校任教。据负责分配的老师说，这是一所很不错的省直属的老中专学校，我很高兴。办完离校手续，拿着报到单，我就在山师校门口叫了一辆三轮车，拉着我和极简单的行李赴任去了。临上三轮车时，我看见报到单上写的地址是：东华街5号。我跟蹬三轮的师傅一说，他说不远，很快就到。

一路上，我都在想象着这所中专学校的模样，憧憬着美好的教学生涯。我心里想，既然是省属中专，规模就不会很小；既然是财政金融学校，条件就不会很差；既然是老学校，老师学生就不会很少。可等到了东华街5号下车时，那位三轮车师傅突然恍然大悟地说了句：“嗨！这不就是城隍庙吗？”我更正他说：“不是！你看这牌子上写的不就是‘山东省财政金融学校’吗？”那师傅也不和我争辩，笑了笑，就走了。

我进了校门，可就傻眼了。左右环顾，这哪像个学校啊？青砖铺地的长条院子，既没教室，也没办公室，像个陈年败落的住家四合院。左边有个路口，好像里面还有个西院，只见近处有几间小屋，却看不到里面的格局。我站在门里，正不知往哪里走时，门旁小传达室里出来个老头儿。问明我是来报到的老师，便很热情地陪我往四合院里走，说是去办公室找领导。

说往院里走，那可真是很靠里了。从院长南头往北，路过东西两边廊房般青砖青瓦的狭长小屋，绕过大北屋东头，进了个短胡同，然后，拐拐拉拉地穿过三个无窗无门的小院儿，走到最北头，才出现了三间办公室，分别是校长室、政工科、教务科。两个办公室里都出来了人，见我提着行李，都心领神会地同我打招呼，亲切地把我让进教务科去。我就此认识了耿校长和蔡科长。耿校长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没想到吧，黄老师，咱们的学校是在一座城隍庙里。”这句话确实把我的心给说凉了半截。

办完一应手续，蔡科长陪我到位于教务科西边小院里的教研室，他说：“老师们都在，见见面，认识认识吧！”我一看，教研室就是两间相连的北屋，东边是专业课教研室，西边是文化课教研室，两屋各走各的门，中间也有门相通。所以我在文化课教研室一出现，专业课的六位老师也都闻声而至，热热闹闹地来围观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老师。老师们和我一握手，兴致勃勃地问这问那，待我都很热情，谈吐都很亲切。有一位年长的老师高兴地说：“咱城隍庙里终于来了女教师了！”逗得在场的十几位老师哈哈大笑。这一笑，又把我的心给笑热了。

见面礼行过，蔡科长便领我到住处去，并顺路观光一下校容。这回走的是西路。从教研室往西就看见一个大殿样的房子，里面又深又宽，黑乎乎的。蔡科长说，这是学校的礼堂。再往西还有个小院儿，北面是伙食科，南面是伙房。折回来，从礼堂门前的一个走廊往南，就进

入教学区。两个篮球场大的小操场居中，北边两头和东、西两侧都有些青砖瓦房，屋脊很高但房间不大，大多是男女生宿舍，能上课的教室总共4间，而且都只一面有窗户，阴暗简陋。操场南面是一座全院最高大的建筑，据说是城隍庙原来的戏楼，旁边有台阶上去，上面的一层，便是学校的图书馆。从戏楼的东头走出来，又是一个小院，戏楼南还有一个二门。正对着二门的，就是很壮观的城隍庙山门。当时山门的三个拱洞均已堵死。但是，山门、二门和戏楼的建筑还基本上保留着原貌，房顶都是绿色和黄色琉璃瓦覆盖，墙体都是厚石和青砖砌成，只是年久失修，显得陈旧破败，房顶上的草倒是长得很茂盛。

蔡科长把我领到山门东邻的一间前低后高斜坡顶的房前，对我说：“条件太差，你就暂时住在这里吧，等有了合适的房子再给你调。”我站在屋门口往东一看，三米开外，就是我进校门后看到的西口，原来我就住在临街的校门口附近。我的对门还有两间屋，一间是卫生室，一间是会计室。进了分给我的小屋一看，条件的确是够差的。那屋子的面积也就七八平方米，黑咕隆咚，还是土地，前面一个小矮木门，后墙一个高的小窗户。屋里安着一张床，一个课桌，一把椅子，一个方凳，都是旧的，西北角还有个煤球炉子。虽然我美好的憧憬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，但总算拥有了我自己的单间，而且我已经把东、西两院巡视了一圈，当时学校就是这般窘况，别无选择。

在城隍庙里办学，规模自然大不了。不过我们这所学校的历史是很悠久的。最早是创建于1946年的北海银行总行会计训练班，后经多次变更校名，叫过干校，叫过干训班，也叫过银行学校，1958年，并入山东省财经学院，1960年又独立出来，由山东省人民银行和山东省财政厅合办了山东省财政金融学校，校址就在原银行干校所在的这个城隍庙里。我到学校时，刚毕业了一个财政金融综合专业班，又招了两个班，一个财政班，一个银行班。我当时教财政班的语文课。

那段时间，我和学生们都吃住在城隍庙里，虽然生活环境和教学条件都很差，但我们的校风很正，教与学的劲头都很足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十分融洽，十分亲密。除了上课，业余时间还开展各种文体活动，国庆节和新年时，师生都会在礼堂里表演节目，整个城隍庙里，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

我到学校的第二年，财政厅决定在泰安单独建立财政学校，省人民银行建了银行学校，我随银行学校迁到黄台，从而结束了在城隍庙里工作和生活的经历。说来，在这座道家祭祀城市保护神的庙里，培养出了不少财政金融系统的人才，这算为城隍庙增添了别样的功能。而在著名的济南督城隍庙六百多年的历史里，我曾在这庙里住过一年，也算是荣幸吧！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。）

□戴荣里

地瓜，是那时少年最有收获感的粮食。在大地上，在刨完地瓜的荒野上，一群孩子，是勤奋的拾荒者。沿着石廊，顺着地线，在大地上奔跑，不一会，空空的背筐里，就是一块块红艳艳的地瓜。或许有几位调皮的少年，搭起干草架子，烧那地瓜吃。地瓜，兔子肉一样冒着丝丝香气，田野上空，一派收获的幸福。少年们拍拍打打地瓜上的黑灰，顾不得撕开皮囊，地瓜就成了满足少年口欲的尤物。倘若能在地里侥幸挖来豆虫，一并烤了，堪称绝配。此时的少年，当是山大王的气魄。耀武扬威，走路的姿势都要变了。仿佛世界就是你的，老子说一不二，看你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广，都不在我的眼里。这样的少年气象，每年秋天，会在代代少年身上重演着。庄稼绿了又黄，大地密了又疏，一年又一年，少年长大了，离开了家乡，家乡却像拉着一条长长的丝线，把少年往家乡怀里揽着。

我时常做梦，总在刨地瓜。

我拣地瓜有一个诀窍，那种地瓜蔓上长出的红根条，一缕一缕，像要远离家乡的游子，容易被收秋的人忽视——或许，收秋的人根本无视这旁逸斜出的侧根所结的果实，这给我留下硕大的遗漏。沿着那条红彤彤的根须，我就像一个挖参人，小心翼翼地挥着锄头，一点点清理着根须旁边的浮土。有时，那根须像专门逗你玩儿的红胡子老头，沿着根须往前扎，却又猛地回过头来，让你猝不及防。当你真正看到庞大裂纹下的地瓜时，心头涌上无限的欣喜。

多年以后，在报刊上看到自己发表的文字，旋即想起当年的那种感觉。在失而复得的意象里，地瓜根须，这个暴露地瓜的“叛徒”，就被一个少年狠狠地抛在后边；当有一年，我开刨开大地上的裂纹，可以直接触及地瓜时，曾经也试图采用这种便捷的方式。但遗憾的是，缺少根须这个叛徒的引领，一锄头刨下去的地瓜，常常四分五裂，难以完美地呈现。只好规矩地再次听从“叛徒”的召唤，一点点地靠近那地瓜。根须是彻底的“叛徒”，地瓜是无辜的“好人”。忘了叛徒，捉住地瓜，几乎是每个少年的狂想。有一次，地瓜根须跑到一块大石头底下，我把石头底下的土挖空，眼睁睁地看到了红彤彤的地瓜。当我探头伸手去扒那地瓜时，石头挤落下来，砸破了我的脑袋。如今，我的额头上依然清晰可辨那次的伤痕。地瓜根须终于与地瓜同谋，让我受了一次伤害，等我和几个小伙伴掀开那块大石头，地瓜已压为碎片。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印象，我是从地瓜身上得到的。我至今保持了喜欢吃地瓜的习惯，大约与此有关——总认为地瓜是靠辛苦劳动得来的宝物。

一日，拿着一包书，从办公室回家。我一般每天坐地铁上班，每次都要带一本书，上班路上就把一本书看得差不多了。等积攒到一定数量，再把那些书们请回家。那一日，用纸袋子把一摞书装好，提着踱出办公楼大门，沉甸甸的感觉，犹如提着一大提地瓜。等到地铁站下车时，纸袋子的提带断了，那些花花绿绿的书，犹如地瓜一样，滚散了一地。我猛然想到少年时的那一幕，此时，多么渴望一个能盛地瓜的大筐啊！遗憾的是，站台上空空如也。远远的，我看到清洁工阿姨在换垃圾袋，就厚着脸皮过去问她要了一个垃圾袋。清洁工阿姨看看地上的书，不无同情地把一个透明垃圾袋递给我。还好，垃圾袋很结实。只是软了些。那些书们在里面，好像探头探脑的小鸟，随时会出来咬人似的。我扎紧了袋口，扛在肩上，真如少年时扛地瓜的感觉。

我扛着这一袋沉重的粮食，从苏州街地铁站出站，一路阔行，扛到家，汗水已经湿透肩背。书们，也是来自大地上的植物，有地瓜一样的重量，那是自然的。当晚睡得很香，梦里依稀刨到最大的地瓜，红根须是想当然的“叛徒”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【岁月留痕】

沉重的粮食